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Listening to the Echo of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Revolutionary Historic Novels and New Historic Novels

.....

# 倾听历史的回音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研究

徐英春◎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Listening to the Echo of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Revolutionary Historic Novels and New Historic Novels

倾听历史的回音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研究

徐英春◎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听历史的回音: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研究/徐英春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068-3438-4

I. ①倾… II. ①徐…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6667号

责任编辑/郭佳宁

责任印制/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2

字 数/192千字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8-3438-4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刘中树

如何审视革命历史小说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如何理解新历史小说对既有革命历史观念的解构与颠覆？为什么同一种历史故事会有不同的两种说法？我的学生徐英春是带着这些思考开始她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生活的。而这些思考在本书中将会由她一一做出阐释。

徐英春的硕士论文以《丰乳肥臀》和《苦菜花》为研究对象展开对比论析，认为正是由于所处社会时代的差异，莫言和冯德英这两位山东作家对相近背景、相同地域的农民生活做出了明显不同的描写和评价，从而使同一种历史生活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展示在读者面前。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她感觉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于是提出由两本小说拓展为两类小说的对比研究。鉴于她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对这两种文学现象确实有比较独到的认识和理解，我便同意了她的这个选题。此后，她收集、整理、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书籍，非常认真、刻苦地对这个选题进行了研究。直到论文基本成型之后，她还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三年中几易其稿，最终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仅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还获得了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的全额资助，使自己的学习成果得以出书面世向社会展示。

在论文写作中，徐英春选取了两类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几部作

品,从内容、情节、描写技巧、时代特征、意识形态、作家经历、思想背景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构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对比研究框架。在革命历史小说方面,她选择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在新历史小说方面,她选择了莫言的《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

在本书的前言中,她首先确定了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两种文学现象。随后,她历数了中国革命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载的时代烙印,并阐明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小说与中国革命现实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

辛亥革命后首先产生的与革命有关的小说主要是文人们通过大量的作品记录和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随着革命、战争的加剧,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家们或积极宣传反战,或以相对消极的情绪揭示了革命、战争给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影响;到了二三十年代之交,文坛上开始出现了以积极姿态倡导革命的革命小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在革命作家的倡导和亲身实践下,革命小说一度成为引领文学方向的主潮;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关于革命的小说逐渐形成一种定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大气候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十七年文学时期蔚为大观的“红色经典”;在新时期,重新审视革命战争的新历史小说应运而生,并由此最终形成了一种与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关于革命历史的思想观念。在这种逻辑推演中,读者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革命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发展的脉络,并由此认可了作者的推断——“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足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氛、历史情绪和人的心理历程。”

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她从表层和深层两条线索进行论述。表层

线索从文学现象本身着手,围绕着两代作家面对同一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展开,充分展示和剖析了两类作品在物质层面的差异;深层线索则始终紧紧围绕着文学、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展开,通过对现象的比较揭示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即,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文学现象产生,时代特征总是在制约着文学在形式、内容、思想、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将文学放回到历史原点进行客观评价,这是徐英春论文的可贵之处。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评价,曾经出现一种贬抑的倾向,认为其在“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脱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是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服务性大于娱乐性的时代产品。对此,她通过学理的论析指出,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文学现象产生,任何作家都无法超越历史年代的束缚。我们不能超越时代,抛开客观历史背景进行评判,而是应该将文学作品放回到历史原点进行客观评价。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革命历史小说的产生,与最初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那些白话小说相比,无论是在艺术形式方面,还是在情节构成方面,革命历史小说都体现出了文学本身的极大进步。

徐英春在书中写到,“作为巨大历史变迁的见证人,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在主观感情上有强烈的倾诉欲望,他们渴望通过忠实再现来表达对历史变化的由衷赞叹。在客观理性上,他们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明确地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和工具,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本人也可以算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与此同时,她使用了“反思性历史”这个名词来概括新历史小说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她的创新之处。

关于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所包含的“亲历性”特征已经有很多人论到,而对于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反思性”特征还有待深入探讨。她在具体论述中明确地使用了“亲历性历史”这个名词来概括革命历史小说的本质特征,并将它与“反思性历史”并列使用来说明自己对革命历

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这两类文学现象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反思性历史”这个名词的提出,我认为是比较贴切的。新历史小说作家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来说是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没有机会从生活上回到原来去真实体验革命,因此他们将视线转向人的命运和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将重点定位于生命个体的“人”本身,以理性来反思历史。

很多民族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文史不分家的历史渊源。文学记录历史的片段,而历史则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徐英春认为历史小说是人类对历史所做出的一种文学性的思考。在本书的第一章,她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文学与历史的渊源关系,例举了历史小说中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从而说明了文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文学的发生、发展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不同的文学思潮、形式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她看来,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处在那样一个珍视并维护革命成果的历史年代,作家把创作本身当成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并努力通过写作活动表达一种革命内蕴;而在新历史小说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作家以一个纯粹的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视文学为个人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站在那段革命历史的远处回顾、揣测当时情境,继而对世界、社会、生活以及人自身进行独特的艺术表达。

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认为时代特征是文学作品中必须承载的。针对所研究的两类文学作品,她概括出了大致的时代特征。即,革命历史小说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演绎阶级概念,作品中阶级阵营泾渭分明,阶级立场旗帜鲜明,阶级感情自然流露。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用政治逻辑所伴随的核心标准进行生活、道德描写,根据阶级成分来决定人物品德的优劣,注重弘扬民族精神,表达政治热情,充分展示、表现阶级对立。而新历史小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以传统文化建构的生活框架,表现现代观念冲击下的传统道德,由传统与现代组合出复杂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写作中淡化阶级性,站在超阶级的观点上,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革命历史,着力表现人的精

神主体的无比丰富性和伟大力量,将重点定位于生命个体的“人”本身,努力挖掘战争中敌我双方作为个体人的不同之处。

新历史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参照物——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全面颠覆。因此,革命历史小说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新历史小说则解构神圣革命历史,认为革命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并行不悖,打破阶级出身与政治倾向的必然联系,对革命历史做出多元化的解构描写。这是本书第三章具体阐明的观点。通过革命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只有也只能通过革命斗争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安全需求。革命斗争不仅满足了农民的生存需求,同时也从较高层次满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者希望被尊重、被认可的精神需求。而新历史小说突破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改传统的革命史观变为非正统的大众史观,从民间文化的视角切入革命战争的历史,传统观念中那种单一纯然的赤色革命历史被斑驳陆离的、杂色的个人史、家史、村史、地方史等各种形式的非正统历史文本所取代。在新历史小说中,阶级出身不能决定个人的政治倾向,人占据了文本的全部,人类共有的关于人性的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体系取代了历史上一度作为绝对权威的阶级意识观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作者在第四章做出了判断。

对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作家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创作心态,因此,面对相同的革命历史素材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从而使各自的作品承载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内涵。

同样是描写战争期间普通百姓的生活,革命历史小说从政治的视角表现出被压迫的人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觉醒过程,力图展示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新历史小说作家注重发掘灾难深重的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通过描述福贵们与上官鲁氏们在战乱中的顽强求生的欲望和生命的韧性,表现人在艰难困境中所具有的非凡的生存能力。革命历史小说在总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认识现实,并强调作品对总的政治路线



的服务性,深入思考如何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和宣传作用,以政治路线衡量作品是否有益于推动现实生活向积极方向发展;而新历史小说以不违背政治路线为基准,通过作品自由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体验,不再考虑文学的宣传作用以及是否能在社会中产生积极的政治思想意义。从创作前提上来看,革命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源于自身体验后渴望进行主观感情表达的冲动,他们的创作是基于感性体验的一种文学表达;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源于作家们经历了中国社会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后的反省意识,他们的创作相对而言更侧重于理性思维表达。而在建国之初的岁月里,文学和作家具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通过文学作品宣传思想文化观念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教化手段。但是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之后,作家们的地位和文学意识也在变化,因此他们笔下的作品放弃了教育和说教的重负,对人们已经熟知并形成意识观念的革命历史生活题材重新进行加工演绎,从全新的角度展示出了一幅幅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革命生活画面。

前几年,继新历史小说潮流沉寂之后,影视界对“红色经典”掀起了新的热衷。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那种革命历史生活又重新被展示出来了,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但其中对于感情和人性部分的处理不乏新历史小说的痕迹。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作为各自时代的重要文学现象都是很优秀的,都从某种意义上缔造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从文学本身来说,他们同样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在本书结语中写道:我们不能超越时代,抛开客观历史背景进行评判,只有公正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我们的文学才能逐步趋向成熟和繁荣。

以上是我读徐英春的《倾听历史的回音——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研究》所想到的,权充作序言吧。

2012年8月5日 于长春

## 前 言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足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氛、历史情绪和人的心理历程。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或一种强劲的文学潮流往往都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任何文学作品的成功总是和同时代的思潮息息相关,必定强烈地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就是这样的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两种文学现象。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潮流。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立志艰苦创业的五六十年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sup>①</sup>,主要讲述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也就是说,革命历史小说是纯粹的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为创作素材的,《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

---

<sup>①</sup>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06页。

说则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蓬勃兴起的一种文学潮流,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与革命历史小说多有雷同之处,“取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sup>①</sup>如《丰乳肥臀》(莫言)、《白鹿原》(陈忠实)、《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活着》(余华)等都涉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革命斗争生活,然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写作手法、取材角度、主观感情投入等方面采取了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并由此对同样的历史题材做出了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截然不同的历史判断。为什么同一种历史故事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探析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的发展变化,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某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启示。

革命历史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作家通过他们的文本透露了他们在讲述话语年代的真实心态,他们以尊崇的心态面对中国革命历史和当代社会生活,并以浪漫的方式创造了自己尊崇的人物和故事。”<sup>②</sup>小人物、下层人民成为作品中的主角并成为英雄,成为被讴歌和赞赏的对象,表现了劳动者在历史发展中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革命历史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农民系列;战士系列;地下斗争系列;武装战争系列……延安保卫战的英雄连长周大勇,勇猛顽强,无所畏惧,在长城线上率领战士们同几倍于自己的敌人较量,坚持了十几个昼夜,可谓九死一生,表现了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解放军剿匪小分队中的杨子荣,

① 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09页。

② 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页。

智勇双全,深入虎穴,临危不惧,也同样表现出了英勇的一面;还有地下斗争中的杨晓冬、金环等形象,虽然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集中体现了人民缔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首先是由于时代新气象层出不穷,人们的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乾坤倒转,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本身即融入了阶级观念、革命观念。作为处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作家,李英儒、冯德英等不能违背时代主流,跳出生活圈子进行创作。他们的文学作品由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忠实的再现了以“革命”和“阶级”论英雄的时代特色。而新历史小说的当代意识更为浓厚。无论是从小说的思想内涵还是写作技巧、理论来源来看,新历史小说也同样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

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不同,新历史小说作家写革命历史生活却没有那种生活经历。由于不能从生活上回到原来去真实体验革命,因此,他们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具有共性的人性情感体验和理论体验,以理性来反思历史,想象、创作的成分超越生活本身。新历史小说作为新思潮、新观念的产物超越了革命历史小说政治图解的局限。小说中淡化性格刻画,而将浓化人性、人情和伦理道德作为重点表现的对象。他们大胆表现战争的荒诞本质以及战争敌我双方灵魂的扭曲、异化,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单纯的阶级意识而言具有更深层的思想内涵。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对这两类历史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深刻关系以及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全新的认识和把握。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自问世之后便立刻受到普遍关注,尤其是受到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而新历史小说作为与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所引起的反响尤为突出,很多研究者都想借助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和话题来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然而,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是在谈新历史小说或革命历史小说时兼论其他。大多数研究是根据某种情节或现象就事论事的

展开,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而且,目前的研究观点普遍是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贬抑,认为其在“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脱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是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服务性大于娱乐性的时代产品。而实际上,回首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革命历史小说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从新文化运动到革命历史小说的产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看看最初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那些稚嫩的白话小说,我们必须承认,仅仅从小说写作本身来看革命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两种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以便人们能够对“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发展变化有一种较为全面、客观的了解。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生活。”<sup>①</sup>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在解放初期那个特有历史阶段产生的特有的文学现象,新历史小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的必然产物。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转变:历史从传统政治史向民间社会还原;由历史必然论转向历史偶然论和不可知论;思维模式由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化思维。

在革命历史小说产生的年代,“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sup>②</sup>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就是冯大娘、杨晓冬、周大

---

① 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译:《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3页。

②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6页。

勇、杨子荣、高庆山等伟大英雄形象的塑造。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积极投合战争文化心理,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作家在作品中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作为参与革命战争的胜利者,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在写自己浴血奋战的那段历史时注重从思想上教育群众的宣传色彩,很自然的淡化己方“失败”事实。由于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他们不愿再度直面那种血腥的创痛而回避对战争残酷的正面描写,于是乎文本中表现出对战争残酷性的忽视。在必须涉及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曾有过的失败时,他们往往采取神化的手法,以诸如“战略性转移”等词汇予以掩饰。曲波在谈到写作体会时明确表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个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允许有一点含糊。”<sup>①</sup>他们的历史观念中充分表现出了一种共识——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

新历史小说是解构主义思潮的产物。解构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新思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法国传入美国,初期遭受到不少批判,但在八十年代渗透到各支人文科学,间接地展现在各种学术思维中,特别是在文、史、哲、心理、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无中心论,否定绝对权威和二元对抗都是打开一个完全开放、生生不息、时时在变异中运转的宇宙观所需要的必然思维方式。它最大的功绩在于解除了长期统治人们思维的传统一元推理方式对人们打开思路的障碍,使“绝对真理的起源与终极的可知性、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可穷竭性、时空隔离对立、知识的整体与绝对正确的可掌握性,等等,凡此类在形而上学结构

---

<sup>①</sup>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第3版,第587页。

体系中被坚信不疑的学说都受到挑战 and 质疑。”<sup>①</sup>新历史小说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重新发掘和认识完全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特征。它们对革命历史小说中所承诺的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在过去时代盛行一时的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可穷竭性等提出了异议甚至挑战。

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是与中国现实革命生活密不可分的。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使劳苦大众苦不堪言。当时的文人通过大量的作品记录和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的权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1921年改版后的)上就有很多涉及革命的小说。如,庐隐的《两个小学生》(1921年第十二卷第八号),从两个小学生的视角展示了革命运动的普遍性以及兵丁镇压手无寸铁的游行师生的残酷性。叶绍钧的《火灾》(1923年第十四卷第一号)以书信体小说展示了兵荒马乱、土匪成灾、天降祸患的农村生活。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加剧,文学反映也愈发及时而丰富起来。仅在1924年一年,《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就集中发表了大量的与革命运动、战争状态相关的小说,并将七号、八号定为“反战专号”,发表了渺世的《投军》(七号)、《谁哭》(八号)、许钦文的《虚惊》(七号)、赵景深的《枪声》(七号)、王思玷的《一粒子弹》(七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八号)、叶伯和的《一个农夫的话》(七号)、静农的《途中》(八号)、徕工的《一个逃兵》(八号)、蒋运宏的《梅岭上的云烟》(八号)等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以相对消极的情绪揭示了革命、战争给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一类小说的创作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产生了新的变种——以积极姿态倡导革命并参与其中的革命小说。尤其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

---

① 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盟”成立后,在革命作家的倡导和亲身实践下,革命小说一度成为引领文学方向的主力。蒋光慈的《短裤党》、《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楼适夷的《盐场》、洪灵菲的《流亡》等作品自觉以文学为宣传工具来表现当时的革命风云,积极引导一代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三四十年代,关于革命的小说因为革命的愈演愈烈而继续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四十年代初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使文学创作发生了质的改变。其中关于革命的小说随着讲话精神的深入贯彻逐渐形成一种定势。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大气候环境的影响下,这一类创作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生活中辉煌的一面,肯定性的描写发展成为作家们的主要写作趋向,并由此形成了十七年文学时期蔚为大观的“红色经典”。这种趋向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在新时期,承继着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理性思考,当代文坛出现了重新审视战争和革命历史的新历史小说,并由此最终形成了一种与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关于革命历史的思想观念。

“任何历史现象、革命,任何作品的产生,意识形态的改变等等,都有各种原因,也只能从原因的角度来解释,但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的原因,因此,历史现象是一个多元决定的现象。”<sup>①</sup>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无疑是文学历史上分别由多元因素共同缔造的两类文学现象,其中记录和反映着两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回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两道风景,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廊中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

<sup>①</sup> 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71页。



# 目 录

---

## CONTENTS

<b>第一章 文学与历史</b> .....	<b>1</b>
第一节 历史、文学与时代精神	1
第二节 革命历史小说:亲历性的历史	10
第三节 新历史小说:反思性的历史	23
<b>第二章 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文本</b> .....	<b>32</b>
第一节 革命历史小说: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演绎阶级概念	32
第二节 新历史小说: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	44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与具有时代气息的价值观念	54
<b>第三章 肯定与解构的分歧</b> .....	<b>76</b>
第一节 革命历史小说: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76
第二节 新历史小说:解构神圣革命历史	92